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温州文革史料	陈明哲
【史海钩沉】	“磁县事件”前后的郑维山	董保存
【以史为鉴】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序和后记	何 蜀·李正权
【拒绝遗忘】	恐怖的“红八月”——一本“抄家登记簿”的历史记忆	佚 名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温州文革史料

· 陈明哲 ·

文革开始时，我已二十岁，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文革（从1966年到1976年）。

温州文革是从1966年夏天“破四旧”、抄家开始。不久，李桂芳等五人的“北京造反队”来温造反，把大字报贴到温州地委门口（当时地委书记是王芳、李铁锋）。李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对毛泽东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部分群众很激动，认为：共产党历来的运动都是整群众，这次整当官的。我当时在温州清明化工厂干合同工；听到“北京造反队”贴地委大字报一事，部分工人很兴奋，当天就一班人跑去地委声援“北京造反队”。

后来，温州医学院、温州师范学院、各个中学都成立红卫兵组织。后来，成立温州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

遵从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文革应进入大联合阶段。当时，温州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温联总”）应运而生。“贫总司”（温州贫下中农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等等都加入“温联总”，惟有温州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不参加。“温联总”还自动加入“省联总”。（浙江省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而“工总司”不承认“省联总”，认为：不能位于省会就认为自己是全省造反派联合组织。“工总司”参加了“红暴”（红色暴动造反派组织，与“省联总”对抗的组织。）

据说“温联总”是得到温州军分区（当时司令员是王福堂）、驻温海军支持；而“工总司”是得到“红暴”支持，而后来得到支左部队支持。

以上是温州大规模武斗的背景。以下转载有关武斗的文章（节选）。

1，温州：文革时代亦是一座武斗名城

1968年温州在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凭借各自政治军事后台，动用正规军武器装备，战斗之激烈在温州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温州武斗最后以有江青和林彪支持的工总司派胜利为结束。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工总司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宏伟的烈士群墓，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上千，加上伤亡更重的另一派温联总阵亡者，温州武斗直接阵亡军民应该在三千上下，伤者无计其数。财产损失以市中区最为惨重。双方火攻对方总部，市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温州元气大伤。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大致如全国其他边远地区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回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抓斗当权派，成立各级革委会成为权力中心，当权派通过未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双方血战，最后背靠林彪江青的一派取胜，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派温联总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温联总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

工总司方面则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直线联系，占据当时温州最高建筑电报大楼，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

温州武斗战事特别激烈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温州属于对台作战的前沿，温州军分区当时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军分区级单位，编制等于加强师。分区司令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部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结下生死之交。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军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之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两个制高点，1967年（原文误为1968年）8月，终于，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区却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名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指日可待。

◇ 梅岙渡口阻击战

就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野战军 20 军火速赴温州武装支左。20 军毕庶朴（原文误为毕叔普）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 20 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 15 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军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庶朴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庶朴发起野性，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重伤亡之后得逞，一路浴血杀向温州。1967 年 8 月的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是南京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三十年过去了，参加这场战斗官兵是否还记得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在这场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兄弟？温州梅岙渡口阻击战应写入解放军战史，它和六·四一样永远是解放军的耻辱的一章。

◇ 追捕匪首姚国麟

毕庶朴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工总司之围。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王福堂被残酷批斗，批斗者将王福堂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

毕庶朴接管温州军分区和主掌温州军管会，全力组织肃剿温联总残余力量。温州所属七个县，各县军分区人武部都有温联总的同情势力。毕庶朴的清缴土匪工作非常艰难。匪首姚国麟几次眼皮底下脱身，其惊险离奇可著书拍电影。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

王福堂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区第一付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当会重报。

□ 来源：《温州__论坛__天涯社区》

2，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血洗鹿城谁凶手？王、关之流。

王芳及其死党王福堂、关克涛之流，呼风唤雨，兴波作浪，举起血淋淋的指挥刀，向革命造反派杀奔而来。其势之凶猛，真无法形容！

王芳之流为了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运，施展了种种伎俩，玩弄了种种花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战火洗炼的造反派面前，都一一告败。于是，王芳之流终于“图穷匕首见”，赤膊上阵了。倾刻，反革命的黑云密集在浙南上空，鹿城到处鬼叫神豪，腥风血雨两交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瓯江之滨。

人们打开用鲜血写成的六月史册，就预感到王芳死党关克涛、王福堂之流操纵着他的御用军“温联总”，正在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镇压正在孕育着呵。

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名暴徒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谁知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真是打人有功，被打者有罪。助纣为虐，荒唐已极。王芳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对其御用军“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在其主子的授旨下，一边招降纳叛，收罗社会渣滓。招买拳师打手，操兵演马；一面散发着血腥袭袭的传单。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制造恐怖的气氛，大造反革命舆论，流血事件已是一触即发了。

七月十一日，天色阴沉，乌云浮游，温联总匪首叶少华、姚国麟在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王福堂的授意和指挥下，拚凑了一个所谓八人小组，同时，一个武装叛乱的方案也随之泡制成了。自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暴匪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包围革命造反派。勾结军内一小撮坏蛋，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之流指使他的爪牙把枪枝弹药奉送给暴徒——温联总。就这样，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还被温联匪抢劫去了 TNT 炸药 5 7 0 0 斤，赤磷 1 4 7 1 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暴匪四设防岗，修建工事，警戒森严。处处是荷枪实弹，马嘶人叫。海风在呼啸，瓯江在怒吼。

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正，温联总匪徒兽性大发，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围剿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同志，身中六弹，壮烈牺牲。于是，王芳之流及温联匪中一小撮坏头头所精心策划的武装暴乱的序幕就此揭开了。紧接着，匪徒在几十分钟内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身披弹带，手持双枪的匪徒也开始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过，暴徒一步一步地靠近。可是在医院里却住着 5 0 0 多位病员。有的因为动手术被麻醉而失去了知觉，有的气息奄奄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产妇正因分娩的剧痛而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工总司的战士这时向军管会提出了保障医院病员及革命造反派人身安全的正义要求，但是关克涛和王福堂默然不语，拒不表态。就这样，七月二__日上午十时，数百名匪徒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 血溅惊飞鸟，硝烟掩蓝天

机枪扫射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前后夹攻，匪徒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疯狂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匪徒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匪徒抓走而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工总司、红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抢救阶级兄弟，可是却遭到温联总匪徒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革命组织革联站的全体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被匪徒强行拖走。一个没有参加温联总、也没有参加工总司的怀孕的工作人员也被五花大绑拖去毒打。匪徒们的铁棍雨点般落在他们的身上、头上，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真是目不忍睹。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无辜的病员亦实施少见的法西斯暴行。匪徒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

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被匪徒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级兄弟被驱散，停止治疗。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炮火还在隆隆，战争在继续进行，情况在不断恶化。

二十五日另时另分，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联总”匪徒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在工总司战士的英勇阻击下，匪徒们不能前进一步。残忍的温联匪暴徒们竟从南门绑架了二十七名无辜群众，捆绑成队，排成人墙，肩架机枪，以作自己的掩体。工总司战士见此不忍开枪，怕打死群众。于是，温联匪们就乘机抢占了伊斯兰、小天津等阵地，廿七位无辜群众见此情景，愤怒填膺，向着工总司的战士高喊，“同志们，不要顾我们，你们快开枪呀！”匪徒又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纵火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海风又猛，真是鸡飞犬叫、天昏地暗。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匪徒又挨户进行大逮捕，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有的当场枪死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大部分被蒙上眼睛推上汽车整车整车的运送，或秘密杀害，或活埋，或掷在江里。到处是尸首白骨，碧血横流。

今天已是廿七日了，匪徒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未成功，而光荣牺牲了。钟楼不能拿下，对战士们冲上去是不利的。火线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焦急的问大家怎么办。一个红卫兵小将斩钉截铁地说：成立爆破组，把钟楼炸开。对，把它炸开，同志们表示同意了这一看法。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一个红卫兵小将抱着爆破筒冲过去了，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两米，这位红卫兵小将刚要举起爆破筒，突然，一颗无情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了，红卫兵小将躺在血泊中。人们的心弦在急剧的跳跃，人人切齿咬牙，为烈士报仇！喊声振天，使匪徒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看，又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了。隆，火光冲天，钟楼炸开了，匪徒的机枪哑了，匪徒慌作一团。喊爹叫娘，弃枪逃去。“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匪徒再一次在溃败时焚烧邮电分局、新华书店……经过两天两夜，无数的消防队员和救火战士在匪徒的机枪下倒下了，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居民流离失所，子散妻离，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革命造反派战士想念毛泽东，盼呀，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进驻温州城。

毛主席亲自派来的6517部队来温的消息传遍了鹿城的每一个角落。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凌晨，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张贴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可是，惨无人道的“温联总”匪徒竟用机枪扫射，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倒下了，碧血染红了标语。关克涛王福堂见机不妙、马上召集“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阴谋策划对付6517部队，扬言要吃掉65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真是胆大包天，嚣张至极，妄图垂死挣扎。全城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挨门登记，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暴的“温联总”匪徒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把抓去的人都关在人间地狱——集中营里。温州医学院集中营，是关押“罪恶”最严重的一个地狱。在集中营内通往大门口的路面上，布下排排小尖刀。许多难友赤脚跨刀山，脚板划开条条血口，血染黄沙，疼痛穿心。这真是“跨进鬼门关，鲜血流一滩。”

集中营里为“犯人”设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就是大小便，也不准叫“报告”违者挨打，而只能“举手”，存心刁难的狱吏又故装作没看见，弄得许多人只好把屎尿拉在裤裆里。受过酷刑生了病的人，不准呻吟，“哼”一声就招来一顿打。古云：蜀遭难，难如上青天，然而，“犯人”平日想讨点水喝比蜀道尚难呵！杀人，已经成为这群野兽的游戏。匪徒为了“教育”“犯人”，经常拉人出去当众活活打死。残忍啦，鹿城倒退到希特勒时代的集中营。

深夜，每间牢房里传来了劈劈拍拍的皮鞭声，多少阶级兄弟在痛苦中渡过这漫长的黑夜呵！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他们没有被匪徒的淫威吓倒。地狱里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巧妙地建立了各牢房之间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位卫校东风红卫兵小将鼓励难友同志：我们是革命者，不怕坐牢砍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他还低声崇敬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钟山风两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总司》战士，多么想念您！

同志们每天定时学习最高指示，唱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匪徒们涌来干涉，歇斯底里号叫：“不准读，不准唱！”可是，这群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的声音象蚊子一般，岂能干扰震撼大地的春雷！

八月十三日早晨。叛匪红楼指挥部乱成一团，惊慌异常。上午十时，匪徒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

分批大屠杀开始了。一群匪徒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楼下牢房的战友这时高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段语录刚念完，匪徒的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快来吧！快来吧，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忽然，集中营外面枪声大作，“拍拍！”牢门被打开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高喊着“同志们，你们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整座集中营。地狱，被炸碎了。呼声震撼着东海，海在呼啸。难友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扯下蒙眼布，交错着悲欢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来……。

“温联匪”在溃败逃窜之际，砸毁了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全城枯干漆黑。残忍的暴徒又一次纵火焚烧鹿城，雄伟的温州城又一次硝烟冲天，火海一片。

匪徒们往近郊牛山一带窜逃，企图死守。可怜近郊人民沦陷在暴徒之手，在白色恐怖中挣扎。

温州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为纸，决东海之波为墨，难书匪徒罪恶之万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凝集在刀尖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向温州地区一小撮“走资派”冲去。直捣黄龙府，绞死王芳之流！

王芳之流终究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胜利定然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

□ 来源：《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编辑部文章。

3，听老爸谈温州的武斗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6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1967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月，林彪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1973到1975年间，两派又多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1967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戴曾任瑞安副市长，但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毕庶朴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当时叫6517部队）的一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认真清算过。

1967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烈的气味飘出很远。“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

□ 来源：《走读温州》，作者：星际骑士，日期：2004-5-31。

~~~~~

## 【史海钩沉】

### “磁县事件”前后的郑维山

• 董保存 •

在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8年早春，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解放军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枪，造成51人死亡，伤数百人，被称为“二·九事件”。此事引起的震动，不亚于青海的“赵永夫事件”。而由此事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变故，更是一波三折，耐人回味……

### ◇ “四不管”的小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了磁县

磁县，这个古称“磁州”的小县城，属河北省邯郸市管辖，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地处中原地带，南接河南，西临山西，东望山东，更重要的一点是，磁县交通十分发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铁路的必经之地。就是这样一个晋、冀、鲁、豫四省通衢的小县，在历史上曾经成为“四不管”的边缘地区。

也许正是磁县的边缘化地理位置缘故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联阶段，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汇集了上千名外地人，那时，这些操山东方言、山西口音、河南腔与河北土语的造反派，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等语录歌，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在磁县政府、学校等地聚集，他们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

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就这样在磁县境内开始点燃。磁县的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地，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垒局面，有的地方保守派占上风，有的地方造反派占优势，通过不断联合、分化，磁县境内逐渐形成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是1967年3月成立的“磁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当时总部设在该县而来村公社白庄。另一派是5月份成立的“磁县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

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反革命派。双方都声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红总”一派由于成立较晚，一度受压，他们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寻求支持。两派相互攻击，贴“大字报”，展开辩论，对立情绪逐步激化，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所谓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两派都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于是开始夺磁县原有的县委、县政府的权。全县的工作全面瘫痪，生产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口号喊得很响，这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得山响，就是因为“文斗”只是打嘴架（现在的所谓口水战），文斗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会发生武斗。磁县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两派组织由口号辩论，大字报相互攻击升级为拳打脚踢，棍棒争斗，两派组织先是用“冷兵器”——棍棒、大刀、长矛等相向，接着，两派开始了抢夺武装部弹药库和民兵枪支弹药并构筑炮楼、战壕工事等的地步。

“红总”派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然而却以拥有大量武器和占据县城主要城区而在“武斗”中占有相对的优势，“县总”在人数上则明显占上风。两派可说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两派间的武斗愈演愈烈，先后在县武装部、时村营、高臾、农电局、槐树、粮库、油棉厂等地多次发生火力冲突和抢枪事件，死、伤人事件开始发生。

#### ◇ 武斗升级——机关枪迫击炮落入造反派手中

1967年11月8日，总部设在来村公社白庄的“县总”组织人员进城开会，由于暗带枪支，两派在会议之中发生武力冲突，“县总”派死亡两人，两派共伤40余人，还有一名无辜群众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一一·八”流血惨案，至今在磁县人民心中留下伤痛，在《磁县志》中有文可考。这一伤亡巨大的事件成为两派组织武斗升级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此事之后，双方的仇视情绪继续膨胀，导致了一连串武斗事件不断升级。

1968年1月2日凌晨，“红总”出动由三省19个地区的200余人组成的战斗队，分三路向“县总”把守的县粮库进攻，两派共死亡4人，其中“县总”一派亡3人。

1月13日晚上9点钟左右，两派群众组织又在县油棉厂发生大规模武斗。这次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县总”派死亡3人。引起8垛棉花失火，烧毁籽棉15万多公斤，救火中浸湿20多万公斤，还烧毁大量苫布、苇席，厂房。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万多元。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9万多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足三十元，一天的伙食费不足三角钱，9万元对磁县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红总”很快全面占领县城城区，主要力量在城外的“县总”则用武力攻城。此时，磁县的武斗，很快发展成为由有着作战指挥经验的退役军人参与指挥，以步枪、机枪作为基本兵器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他们已经打开了磁县武装部弹药库，抢走了那里的枪支弹药，据统计磁县当时的库存武器有步枪在一千余支，机枪30多挺，手榴弹上千枚，子弹上万发。有人说，这些武器的杀伤能力，足以使这个小县城血流成河。

“红总”以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为核心，在县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架设机枪、冲锋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配系，封锁控制了全城主要街道、路口，严防“县总”一派偷袭。

“县总”一派则用当年八路军武工队的办法，不断派出“侦探”到城门四周活动，他们化妆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混进县城，还有人说他们借了军装，冒充解放军来攻城。无论是“红总”还是“县总”，这时都已经失去了理智，都处于一种极度的狂热状态。笔者在采访过程中，结识了当时曾是红总一派的机枪手赵培卿，他写的一首诗，详细记述了自己当时所经历的武斗的情景，不妨在这里抄录一段：

.....

不问青与白，拿砖砸头晕。顿时血如注，神志已不清。押解下鼓楼，活像俘虏兵。将要到北门，闻拉枪栓声。一声都跪下，谁敢不依存。眼前一片黑，刺刀扎脚跟。趁机反绑我，紧捆不留情。跃进学校里，两次把我审。排队欲枪毙，何患词无穷。死罪称幸免，棍棒不留情。步入阴阳界，置我见死神。解脱肉身苦，飘然入西冥。反背上汽车，眼前乱金星。一人欲发疯，拖拽往下仍。难友相救护，才免横祸生。车进农机站，一片斥喝声。这个早该死，那位应抽筋。钢条三角带，锥刺用手拧。抬头巴掌打，低头踩脚跟。狂言出恶语，纵情戏弄人。小手不许解，大便拉裤中。难忍几欲死，无奈咬破唇。转移上汽车，不亚过鬼门。远用砖头砸，近用巨脚蹬。冷风刺骨寒，飞车更招风。车向何处去，月儿不吱声。哗哗水声响，悄悄问星星。探照灯光亮，方知到兵营。对头二十四，不予我解绳。问我名和姓，记忆全失灵。稍微有知觉，疼痛似扎针。口咬十指破，就地乱打滚。指切身上肉，拳头乱捶胸。昼夜挖心痛，断珠泪水凝。求生何如死，怨天恨同君。

.....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斗持续升级。到了1968年的2月份，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已经失去控制！两派组织的武斗，自然会影响到就在县城通过的京广铁路，先是疯狂的武斗波及到过往的列车，后来随之发生了袭击、拦截火车的情况……

#### ◇ 京广铁路告急——郑维山接到上级命令

北京，国务院业务组接到铁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报告：京广铁路河北省磁县段告急，这里的造反派拦阻列车，将京广铁路的50对电话线破坏了48对。当铁路工人乘车去抢修被破坏的电话线时，车子中弹21发，7人被抓走……

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当然知道，这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铁路电话线的完全破坏就意味着京广铁路的大瘫痪。这一大动脉如果被切断，其后果不堪设想。消息很快报告到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处境也很艰难的周恩来总理为此坐立不安。

至于中央决策层是通过几条渠道得知磁县武斗情况的？现已很难考证。有人说可能是在武斗中处于劣势的“县总”一派将“红总”破坏铁路的事情“捅”到了中央文革，也有人

说，是支持“红总”造反派“恶人先告状”。虽经多方走访，笔者也未能得知详情。但铁路军管部门的相关人员将此事逐级上报，最终上报到了中央，是有案可查的。

其实，磁县的武斗，只是中国当时情况的一个缩影。就在磁县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另一条铁路大动脉上的重要枢纽徐州，也发生了严重事件，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徐州事件下达了（68）26号文件（即下文提到的“2·6命令”），只是当时“2·6命令”没能立即传达到这里。不要说磁县的群众组织不知道这个命令，就是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也是在2月8日晚才从电话里听到这个命令的。

1968年2月8日，郑维山正在石家庄参加完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当晚，在八一剧场看演出。9时，党委办公室秘书吴炳州接到总参作战处蔡洪江电话。

电话那一头，蔡洪江声音显得十分焦急：“9时20分，总理电话指示，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经林副主席批准，63军应立即派两个步兵团到达武斗现场，负责隔开，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坏铁路、电话线是完全错误的，如继续这样做，这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极少数坏头头必须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具体按‘2·6命令’办。总理和杨代总长要直接向郑司令布置任务。”

接完电话后，吴炳州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找到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报告了有关情况。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驱车赶到八一剧场，向郑维山作了报告。郑维山一行赶回招待所，马上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杨成武的声音急促，说：“总理要找你。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影响了铁路大动脉，要采取果断措施。详细情况总理还会向你交待，这项任务非常特殊，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这时总理的电话来了：“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对于磁县事件，可以按‘2·6命令’处置。‘2·6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

总理说：“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就在郑维山和周总理杨成武通电话的同时，秘书们正通过保密电话记录蔡洪江传达的“2·6命令”具体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确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的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为此特命令如下：

（一）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受蒙蔽群众要立即提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刽子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狠抓革命，狠促生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加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同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三）铁路沿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革命群众，有维护铁路交通安全和保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必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发现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情况，应立即报告当地驻军，并协助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铁路交通安全。

（四）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立即采取行动，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逮捕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解放军进行阻击、追剿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目的。我全国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务须同铁路革命职工和铁路沿线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合作，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蔡洪江强调说：“特别是第四条：担负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车辆、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采取行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收拢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毙捕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行为抵抗和窜逃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两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阻击，追缴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的目的。”

看完“2·6命令”，郑维山说：“这就对了嘛，这个命令早下就好了！对那些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

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军队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一些地方部队开始“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说是不介入，实际上是介入了。”到了1967年夏季，各地相继发生武斗，也随之发生了抢夺军队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事件。那时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事情愈演愈烈，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9·5命令”。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九·五命令”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抢枪的问题。对此军队的人，特别是指挥员肚子里是有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军队对“2·6命令”是真心拥护的。郑维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要63军军长！”

◇ 雷厉风行——部队开进磁县

郑维山要找的63军军长张英辉是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部队最高首长，他此时正跟随郑维山参加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大会。郑维山简单向他交代了任务，说：“你们派一个团，立即出发，到磁县执行任务。必须尽快恢复京广铁路畅通，但是也要竭尽全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来恢复铁路畅通。”

张英辉问：“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郑维山说：“如果政治攻势不成，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只好封锁枪眼，一定要把双方隔开，将武斗制止。一定要注意，弹药必须控制，不能放在战士个人身上。”

张英辉答应着：“是！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

布置完任务，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求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于是他当晚又返回北京。实际上，与郑维山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的有关领导，要他们从驻防洛阳的1军也派一个团执行这一任务。两个军区派两个团开往了河北省磁县，这个四不管的边缘地区。

何以中央军委对小小的磁县武斗事件派了两个军区的部队参与呢，有人分析原因是，首先，磁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调以上两个军区的部队来此的速度最快，另外，为避免军队卷入磁县的派性斗争，支一派压一派，同时派两个军区的部队可以互相制约，确保军队处理磁县武斗事件的中立立场。

1968年2月9日上午9点，北京军区63军的一个团，武汉军区1军一师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集结地域。与此同时，邯郸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与“县总”派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县总”。

9点40分，两个团的部队在63军副军长曹步墀、参谋长耿淑明的指挥下，来到磁县城门外。部队首先全面开展了政治攻势。用广播车反复广播着党的方针、政策、

“我们奉命前来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的广播声此起彼伏。对拒不弃城的“红总”派，用大功率的喇叭广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下发的“2·6命令”。

“……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车辆、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1967年“九五”命令，采取行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收拢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毙捕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行为抵抗和窜逃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两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阻击，追缴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的目的……”

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中，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身背冲锋枪，然而，战士们的枪内没有一颗子弹，子弹全部掌握在带队的干部手中。

由于“县总”一派处于弱势，见到解放军开到磁县县城附近，他们不但不抵抗，而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向解放军报告“红总”一派的消息，当部队向城里开进时，他们跟在部队

的后面，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组织，也随着“县总”跟进。部队官兵一再劝诫，仍不能使其完全与部队战士分开。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解放军是来帮他们打击“红总”的印象。

#### ◇ 战士伤亡——迫不得已开枪还击

据当年把守着磁县城北面的鼓楼的重机枪手赵培卿回忆，当他看到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方块队伍，拿着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朝磁县北门走来时，有人说：“这是假解放军！”他也将信将疑。

在当队伍走到距离鼓楼300多米时，1960年代初才退伍的赵培卿认出来，这个队伍整齐、步伐矫健，闪亮的帽徽和领章，绝对不会是假解放军。特别是那些战士的口音，明显是南方人。正在此时，有人还在喊：“假解放军来了，打！”

“这是真解放军！”

“他们是假解放军，开枪打呀！”

“砰砰！”

有人朝解放军的队伍开了枪。广播车上有人中弹倒下。

“砰砰！砰砰！”走在队伍前排，手持毛主席语录牌的战士倒下了。部队的队形乱了，战士就地卧倒……

“红总”派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重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转瞬之间，10余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战士的情绪已很激愤，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仍然只能是以宣传车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

近乎疯狂的造反派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的火力更猛了，压制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双方对峙到中午，部队伤亡激增。几乎与此同时，下午1点36分，京广线上的第206次列车从磁县经过，气焰嚣张的“红总”再次袭击了列车。

时任北京军区187师政委的曲凤图回忆说：他当时在磁县有作战指挥所，不断将这里的新情况向上级汇报。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副军长见无法凭借政治宣传争取两派放下武器、停止袭击铁路行为，终于下达了向造反派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

两点钟，三个团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城内制高点上的造反派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

“如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这样的喊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枪声还在响，子弹还在飞。部队开始鸣枪警告。此时，盘踞在制高点的造反派中，有的人放下了武器，多数人还在顽抗。部队只好采取措施，封锁这些火力点。

“开火！”

指挥员一声令下，每个团挑选出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被打哑了。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真的开了枪，造反派们被打得四散奔逃。“红总”的全部防线，很快被冲垮了。傍晚时分，“红总”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

高点，全部被攻下。造反派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红总”成员一个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

有资料记载，在当天，解放军抓住“红总”派成员670人。怀疑对象800多人。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至今，“二·九”事件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磁县人的记忆却是难以磨灭的。前面提到的那们赵培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名为《难忘的“二·九”》的长诗，这首长诗虽然只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二·九”事件，却可以成为这一事实佐证：

一九六八春，铭刻永记心。二九一残案，全国骇听闻。吾为当事者，记忆尚犹新。二九刚黎明，鼓楼喇叭鸣。极目朝北看，鱼贯入北门。机枪吐火舌，侦探假与真。健步不紊乱，列队似雁群。后背冲锋枪，衣服一色新。帽徽闪金光，肩章亮红星。手摇红宝书，伴奏语录声。深信无疑虑，绝非是冒充。千钧一发旦，泰山压顶重。怒目扫四周，果断下命令。都把枪放下，是真解放军。蜂拥一齐上，占了鼓楼顶。心慌意烦乱，退弹卡壳停。每欲忆此事，惊恐欲断魂。

◇ 江青发难——“郑维山是开枪镇压造反派的大军阀”

完成任务后，63军向军区作了报告，郑维山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

“二·九”事件后，磁县严重对立的两派不复存在。1968年3月14日，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磁县直属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恢复。5月，磁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机制。

但是，关于磁县事件各种说法并没有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终止。反而是一波三折，越传越凶。据参与“二·九”事件作战指挥的187师政委曲凤图介绍，磁县事件后，有人传说，1968年2月9日下午6点钟左右，军队有关部门收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报，电报称转达周恩来总理意见，磁县事件要和徐州事件要区别处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按2·6命令对待磁县事件。又有人说根本没有此事，是谣言。

也有人传说，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偏听偏信，只是听了“县总”一派反映上去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开枪决定。还有人说，“中央文革”的人看到造反派被打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对此事提出质疑。传说毕竟是传说，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对这些传说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最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

后来，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军区只得派出工作组对关于磁县开枪事件进行调查。当时的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科长郭春宣是调查组长，4月，郭春宣带领毕可升、孙春明一行三人前往磁县实地调查。

4月29日，调查报告出来。“二·九”事件中，“红总”和“县总”双方共有5000余人参战，其中“红总”派参战近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数百人，部队共死亡18人、伤77人。除京广线铁路交通受阻之外，在事件和两派的武斗中共烧毁粮食80多万斤，皮棉10余万斤，还烧毁部分建筑物和一些机器设备，直接经济损失达27万余元。

事隔三年，1971年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江青等人却以磁县开枪事件为由，诬陷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下令开枪镇压群众……”江青说：“郑维山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一贯有军阀作风。他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在江青等人的策动下，对郑维山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人说：郑维山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有人攻击他，一直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对此，郑维山保持沉默。因此又被说成是顽固对抗……

事隔多年之后，郑维山还一再提起此事，他说，这才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封锁枪眼完全是执行了军委指示的，她却说我下令开枪镇压群众，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江青等人究竟知不知道郑维山是奉命处理磁县事件呢？应该是知道的。“2·6命令”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能不知道吗？就是在华北会议上，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说了实话，他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江青、康生等人非要把擅自下令开枪镇压群众这样的天大罪名安在郑维山头上呢？郑维山在后来的言谈中曾经提到，江青反革命集团污陷迫害围攻他的真实目的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这话是有道理的。

在文革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他尽己所能，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对那些制造动乱的分子有所遏制，而这些正是江青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在乱中夺权，乱中渔利，周总理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障碍，因而打倒周恩来，是他们早晚要走的一步。

也正如郑维山后来所说：如果当时我说是周总理下命令的，不是正中那些人的下怀吗？在华北会议上，郑维山被批判后，“二·九事件”又出现了新的波折——有人散布说这一事件是郑维山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是血洗磁县。

一些不明真相者跟着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说在这次事件中，无数人被打死，打死的人都用大土坑埋掉了。再后来，当年被造反派打死的解放军战士的尸骨被从烈士陵园中挖出来，抛尸荒野。直到今天，这些烈士仍然含冤九泉……

据《磁县志》记载，1971年9月，有关部门对磁县“二·九”事件在押的48人予以平反，并当场释放，销毁在押中的所整档案。1975年8月28日，邯郸市地委在肥乡县办了磁县“二·九事件”和“清队”扩大化学习班，追查肇事者，分清责任，落实政策。磁县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县总”还是“红总”均被当作受害者平反。

至此，磁县开枪事件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这一事件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结局。有多少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反省啊！

1982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郑维山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 原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三期

~~~~~

【以史为鉴】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序和后记

• 何 蜀 • 李正权 •

◇ 序——何蜀

大约十多年前，在重庆市南岸区文联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南山风》上读到一篇连载多期的纪实文学《重庆武斗琐记》，作者署名李衡之，内容相当扎实，文笔生动，并蕴含较深刻的反思，非亲历且有认真观察与思考者不可能写出。我向主持该刊编辑工作的杨金邦打听，才知道作者真名李正权，是文革中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是当年武斗的参与者。我于是与李正权联系上，从此成为朋友，有了对文革特别是武斗历史进行回顾、探讨的多年交流。

进入新世纪后，我曾经打算编一本有关重庆大武斗的资料书，想把李正权的《重庆武斗琐记》中一些内容节选编入，但考虑到拟编入书中的其他各篇都是亲历者的回忆或日记等资料，而这一篇却是以第三人称写的“纪实文学”，不大好混在一起，就建议他用第一人称改写成回忆录。他当时还在一个政府机关上班，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写有这样的“敏感题材”作品，更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文革中的武斗（这也是他在《南山风》上发表时用了“李衡之”化名的原因），所以就暂时搁下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后，他才着手改写，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让我看重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其内容的真实生动，二是其深刻的反思。

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来看，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我接触了解过一些文革造反运动的亲历者，发现在这些人当中，能够对文革特别是对自己参加过的造反运动进行反思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文革前就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而受到压抑的人，他们因自身及家庭的遭遇而对毛泽东缔造并力图通过文革来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弊端有直接的切肤之痛，对于他们来说，反思那段历史几乎就是出于本能；另一类能够反思者，是那些虽然“家庭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但在文革之后能够始终坚持继续学习，不断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使自己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的人。李正权就属于后者。

李正权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工人，“红五类”中的头一类。他的学历也不高，文革爆发时只是个初中生。但他并没有像有些自认为是“领导阶级”的人那样以“大老粗”为荣，因从小对学习的热爱，特别是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文革武斗期间他都在学赋诗填词），养成了不停顿地自学的习惯。即使后来下农村当知青，进工厂当工人，他都从未间断过在逆境中自学。而且，全凭自学，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及许多文史随笔，而且还在质量管理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含与人合作），成为国内知名的质量心理学专家。他写的好几篇短篇小说（见本书附录），都是以文革武斗为背景的，可见他对这段历史的长期关注。

李正权这部回忆录，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他还以较为广阔视野，在亲见亲闻的基础上加以调查采访所得，比较全面地记叙了重庆文革从文斗到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武斗到后来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的发展演变，记叙了他所了解的武斗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别是他曾经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那些专业武斗队中正当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及从抢枪到交枪、从战场厮杀到战后杀俘、从胜利进攻到败退逃难的武斗全过程中许多重要情节，许多在正史中不会记载的真实生动的细节。这些都是他在亲身经历中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积累起来的，可以让人更加真实地把握那个年代的脉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

我们这一代人（我比李正权大两岁），从小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教育中成长的，我们当时能够读到、看到的文艺作品，只有诸如《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战火中的青春》之类。这样的文艺作品让我们受到一种把革命、战争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浪漫思想的熏陶，以致让许多人从小就向往、憧憬着献身革命、投身战争，甚至以未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深感遗憾，很少会想到战争的残酷，更不会想到战争对个体生命、对人性的摧残，更不要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样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战争了。李正权这部回忆录，通过他自己以及他那些“战友”的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对文革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教科书和文艺作品里不会写到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2014年2月9日于重庆风江阁

◇ 后记——李正权

写完本书，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答案：一是文革真的能够避免吗？二是文革还有没有正面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网上搜索，可以发现有好多种答案，有的人认为不可避免，有的人认为可以避免。不管是持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说法的人，几乎都把原因归结到执政党，甚至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持可以避免说法的，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他们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因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按邓小平说法，只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只要解决了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只要解决了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之类，就可以避免。按陈云的说法，只要在党内实行了民主，让毛泽东的权力受到约束，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就可以避免。持不可避免说法的，大多也是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历史经验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文革就是杀功臣，或者文革就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对政治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至今也要拥护文革的人，也认为文革是不可以避免的。他们认为，文革全面发生的时候，社会已经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不可避免。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把如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投射到了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因此他们甚至呼吁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的泥沼，但其谬误却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我们只说前面两种观点。

的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的个人特性，例如他的政治思想、浪漫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对文革的发生以及文革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毛泽东，文革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景象，但依然还是要发生的。

据说，世界上上百种的古文化或者消亡了，或者退场了，只有中华文化从古代走到现代，几千年来延绵不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让中国人背上了沉重的文化负担。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化负担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人们往往还只是从民间或只是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来分析这样的表现，其实，这样的表现在那些政治人物，包括那些所谓的伟人身上可能更突出，引发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对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四人了，人们也愿意称他们为伟人。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他们的一些言论，他们的主要行为，甚至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与毛泽东的大跃进，蒋介石的新党计划与毛泽东的“踢开党委闹革命”，邓小平的“垂帘听政”与毛泽东的“退居二线”，岂不是完全相同？至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与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与毛泽东的反右斗争，邓小平搞的“六四”事件与毛泽东搞的“四五”事件（不再过多举例），虽然其原因、过程、形式、结果、影响等方面都有许多的不同，但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其出发点、其动机、甚至其手法又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如果孙中山能够完全掌权，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十年，他搞不搞大跃进，搞不搞文革，真还说不清楚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所有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伟人，虽然政治思想不一定相同，但都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都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而且都面临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大课题。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他们更不可能脱离既定的历史条件，去创造他们想要创造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可能就是他的随心所欲，至少不可能全是他的随心所欲。我们当年参与文革，参与武斗，参与战争，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着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深刻原因。因此，如果我们把文革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认为，文革很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文革很可能就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

我们来说两个假设：

假设一：如果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去世，文革由刘少奇来主导，文革会怎样？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已经不容分辩地说明，刘少奇将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如果是那样，虽然其形式和某些内容以及其规模、持续时间、深入程度和后果可能都有所不同，但对中国的现代化阻碍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并没有多少区别。在那十年里，经济可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对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其阻碍作用可能是依然相同的，至少也是相似的。况且，刘少奇还有所谓的“驯服工具论”，连共产党员都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得有非分要求，何况一般老百姓呢？

假设二：如果林彪的耐心和隐忍再加强一点，能够等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又会怎样？按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的安排，毛泽东造成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可能停下来，整个社会可能“克己复礼”，但是中国很可能就被他们引到当年日本走过的那种军国主义道路上去，中国人很可能陷入法西斯专政之中。事实上，当年的军管会在地方、在企业中实施的就是那一套，他们的一句话就成为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也无法违抗。如果那样，中国就更加背离了现代化进程。按林彪的“复礼”，人被分为不同的等级，人人都要压抑自己的欲望，那还谈什么民主、自由，还说什么法治！

我们往往都爱做“事后诸葛亮”。文革一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标榜自己是受害者，都标榜自己很早就开始反对文革了。特别是那些当权者，包括那些早就“结合”到“新生红色政权”里的当权者，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纯粹的受害者，找当年冲击过他们的群众算账（且不用反攻倒算这样过分强烈的字眼）。他们确实受过冲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甚至大大超过那些曾经冲击过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些很早就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文革十年，可能受了两年冲击，却在后面八年实际上领导着操纵着文革，所做的坏事可能更多更坏。他们本来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更让人莫名其妙。我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拥护者，但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之外，我敢说，没有几个人敢于拍着胸膛说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无辜的。相反，像我这样自以为“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其中的，并不在少数。即使是那些逍遥派，也仅仅是外在表现不同而已，其内心和我也差不多吧？因为我们都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包袱，都脱离不了既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随心所欲，也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

因此，反思文革，不能只责怪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能只打倒林彪、四人帮，更不能只批判所谓的造反派，还应当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人类学的多个侧面去研究，去分析，才能真正治本，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来一次”。

再说第二个问题。其实，文革有没有正面意义这个问题，其基本含义就是，没有文革，会不会有改革开放。我们且不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去分析，只说说文革对老百姓民主意识发展的作用。

如今，一些人竭力美化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其实，那十七年里，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有了一定的进步，而且诸如“当家作主”、“人民政府”、“群众路线”之类说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从来只能生活在强权下的普通老百姓。但是，从整体来看，不管是社会的民主程度还是人们的民主意识，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随着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日益深入，加上诸如反右之类政治运动，反而强化了人们的奴化意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大跃进后饿死三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向中央反映情况之外，除了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之外，整个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极少有人出去讨饭、出去逃荒！虽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搞清楚像反右、大跃进那样一些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但是，总是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或者当权者怎么说，被管理者就怎么做，极少有人反思，更极少有人真正反对（哪怕只是在心里的反对）。甚至那些被整的人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谢主隆恩”，认为自己有罪。

1968年初，全国已经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毛泽东却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不管如今的人们对这段话如何理解，但文革的确是把中国人都发动起来了，都动员起来了。虽然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曾因此而受过苦、受过难，但却从一定的角度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至少让中国人认识到，当官的也可以被打倒，权威也可以被怀疑。文革期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从理论上分析，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思潮，如果中国人还一直处在“谢主隆恩”的状态中，要搞改革开放，要出现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那样分田到户的事件，要涌现诸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人物，肯定是不大可能的。更不要说，没有文革中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没有文革对中国人的切身教育，没有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那种反思，中国能够出现天安门事件，能够出现如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我们对民主、对自由、对

法治，也就是对现代化的认识，甚至也不可能有这样强烈的向往！从历史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却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并不完全等于高楼大厦，也不完全等于 GDP 世界第一第二之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认可普世价值，没有民主法治，没有马克思所说那种人的完全解放，也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历史的包袱越重，这个过程也就越长越艰难。在这个已经超过了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文革十年可能更加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教育了整个中华民族，是那十年的灾难唤醒了整个民族，让我们懂得了反思，让我们认识了民主，认识了法治。不过，由于当局始终压抑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育作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得到释放。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唱红打黑”之类模仿文革的做法，才有了那么多呼吁文革“再来一次”的杂音。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有这样那样形式的倒行逆施，虽然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还会遇到一个又一个难题和一个又一个阻碍，但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妄图让文革“再来一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薄熙来的垮台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不正视历史。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不正视历史，就不可能开辟未来。其实，不仅仅国际关系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正视历史，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的包袱就会压在我们身上，就会拉扯我们的后脚，就会阻碍我们去开辟未来。在这方面，我们是向二战后的德国那样，认识错误，彻底反思，采取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各种措施，坚决予以否定，防止其重演呢，还是像日本那样，躲躲闪闪，否认历史，歪曲历史，以不搞所谓的“自虐史学”为借口，幻想着“再来一次”呢？战后，日本一直或明或暗否定自己的侵略行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样做也没有阻碍其经济发展，但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是不是历史问题在对他们进行惩罚呢？而且，这种惩罚是不是还将持续，甚至还将改头换面，还将加重呢？我们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会不会像一个定时炸弹，在某一天突然爆炸，让我们措手不及，不仅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动荡，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害呢？

不过，我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文革十年让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是不可能白白付出的。早迟总会有那么一天，通过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通过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思，中华民族就会向前大大地迈进一步，中华文化也将洗刷自身的那些污点，真正走向现代化。当我们的后人用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看这段历史时，他们或许会说，文革那十年，文革后对文革反思压抑的那几十年，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中华民族终于还是走向了现代化，中华文化终于还是走到了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如果说文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也自有其历史价值。如今的问题在于，为了防止文革“再来一次”，为了中华文化更好地更快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应当怎样更充分地利用文革的这种历史价值。

首先当然是加强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了。作为文革的一名参与者，一个过来人，为文革留下一点记忆，留下一点多少可以供后人研究文革、反思文革的参考材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得知我在写作本书，有朋友说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的确，当局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不许说，不许写，不许研究，更不许出版，本书写出来很可能依然只能放在抽屉里，说不定还可能引来诸多麻烦。但是我想，参与过文革战争的那一代人，包括像我这样当年还没有真正成年的人，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时日不多，精力渐枯，继续等待的本钱并不太多，还是早点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好。

1994年，我写了十万字的《重庆武斗琐记》，但却没有地方发表，只好放在抽屉中，让书稿睡觉。薄熙来事件后，我想，不能再让其睡觉了，就找了出来，换了一个写法，重新写成本书。为了供历史作档案，供武斗参与者们反思那沉痛的教训，我力求尽量真实地反映武斗的本来面目。但是，当年处在极度的混乱中，两派都爱夸大其辞，瞎编伪造，甚至公开造谣。我只能保证自己经历的事是真实的，而难以保证当年从大字报、传单、小报、参与者自述等等渠道获得的记忆的真实性。即使是我自己亲历的，也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和遮蔽性记忆等原因，难免有失真之处。作为一部原生态的回忆录，本书可能在内容、结构、语言、文字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我真诚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既然要真实地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当事者，这就很可能给某些当事者带去某种风险。为了不给当事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个别当事者我只好隐去其真实姓名，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即使如此，局内人或明眼人一看，也立即能够知道这些隐去真实姓名的人是谁，更不用说其本人了。但这也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让涉及的当事人不快，二是让读者感到困惑，并有可能因此怀疑本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在写作过程中，我因此而一直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在现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只好保持这种变通方法。因此，我一要请本书涉及到的不管是用了真实姓名的还是没用真实姓名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鉴谅，二要请读者鉴谅我的这种变通。

此外，我还将若干年前写的一些有关武斗的故事、小说之类文章作为附录或作为本书的一个章节，也呈现给读者。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多少看到我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早在十多年前，何蜀先生就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并且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如果不是他和其他几位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本书肯定难以出笼。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谢意。

2012年10月10日初稿毕

2014年1月30日第七次修改

~~~~~

## 【拒绝遗忘】

恐怖的“红八月”——一本“抄家登记簿”的历史记忆

· 佚 名 ·

那场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化大革命”，曾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遮遮掩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支离，甚至遗忘。当年的“牛鬼蛇神”现大都已作古；被利用裹胁其中的“革命小将”也都步入花甲之年；八〇后、九〇后们听闻那时期的荒诞事也将信将疑。但是承载历史的遗物却可以唤醒记忆，重现历史。笔者见到一本文革初期天津市河北区光复道街（原意大利租界区）四清工作队使用的“抄家物资登记簿”（以下简称“登记簿”），上面记载了1966年8月期间，该街区300多户被查抄居民的物资登记。这只是当时全国、全市红色恐怖的一个缩影，史称“红八月”。

原意租界居住区为天津九国租界之一的意大利租界，是近代中国惟一个意大利租界，也是意大利在境外惟一处租界。天津意租界1902年6月开辟，面积771亩，西邻奥地利租界；东邻俄国租界；南邻海河与市中心的法国租界和日本租界隔河相望；北至京山铁路，毗邻老龙头火车站（今东站）。意租界当局重视市政建设，市政设施发展很快，1914年将大马路（今建国道）建成天津第一条柏油马路，并最先将区内全部路面修成高级路面。沿街建筑风貌各不雷同，意式风格的角亭、圆拱、廊柱各具特色；广场、花园、文娛场

所点缀其中，成为津城一处高级住宅区。名人、富家纷纷入住，如民国总统曹琨、冯国璋；两广总督张鸣岐；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鲍贵卿；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戏剧家曹禺；著名报人刘髯公；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天津市市长张廷谔、潘毓桂等都建有宅邸、寓所。1943年汪伪政府举行了天津意租界收回仪式；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正式收回。

解放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租界被视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产物，原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的纪念柱被拆毁，回力球场被改造成工人文化宫。一些单位和新居民的涌入，使大部分独居小洋楼变成大杂院（楼）。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荡涤，租界文化逐渐消失。近年，为开辟旅游资源才重新打造成“意式风情区”。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天津，原租界居住区首当其冲，其中打、砸、抢、抄最疯狂的“红八月”成了部分居民的“黑八月”，从登记簿上查抄物资记录可见一斑。

为什么建国十七年后的和平年代，以“革命”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对公民财产和人身进行严重侵害，居然畅通无阻顺理成章？让我们回顾一下“红八月”的政治形势。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2日，领袖在中共中央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18日，领袖在天安门上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他的一声“要武嘛！”，把之前以大字报、大辩论为主的文斗，迅速演变成暴力行动。19日上午，北京三十万红卫兵冲上街头奉旨造反，“破旧立新”的红色风暴横扫首都社会每个角落；首都门户的天津迅即被波及，群众“革命热情”迅速升温。

据20日《天津晚报》报道：“这两天来，游行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地涌向街头，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了海河两岸的上空……”；当天，天津媒体还以通栏标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进攻》向全市人民发出紧急动员令。21日，天津市举行了六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文化大革命；会上，红卫兵第一次在天津官方政治舞台上亮相。22日，津城各校红卫兵，以“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战斗口号，冲进大街小巷，抄家之风肆虐津门。同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小将的暴力行动更加有恃无恐。23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好的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给红卫兵的疯狂行为火上浇油；据官方公布的不完全统计，8月23日至9月下旬一个月，天津抄家12000户（文革全市共抄家109720户）。24日，《天津日报》发表社论“欢呼红卫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为红色恐怖助威造势。25日，津城扫“四旧”之风愈刮愈烈，据第二天《天津晚报》描述：“两天来，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们，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战斗锋芒到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不论是在繁华的市中心区，还是在‘偏僻’的街道里巷，一队队的‘红卫兵’们，……，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革命洪流所到之处，‘四旧’和一切牛鬼蛇神无处藏身……”。

26日，天津报纸在一版醒目位置刊登标题为《横扫旧习俗的革命怒涛汹涌，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文章，向这场“革命”的对象发出了警告和威胁。在那些阴霾恐怖的日子里，连日的抄家批斗往往从白天持续到华灯初照；夜幕下，在居所里悄悄自杀者少被人见，但时有所闻；晨雾中，海河、水上公园湖面上的浮尸及畔边树上吊挂的冤者却向路人展现着运动的惨烈……。

这本“抄家登记簿”是凝固那场空前浩劫点滴一瞬间的活化石。登记簿中详细记录了1966年8月28日至9月5日九天来，在天津意式居住区收缴查抄物资情况（不包括现场砸毁、烧毁及查抄人员带回所在单位组织的物品）。使人联想起当年希特勒党卫军驱犹场景，留下了人类史又一黑暗一页。登记簿上，查抄日期、被抄户主姓名、住址、抄缴物资名称等都清晰在册。簿内所贴附的多张被抄户致街“四清工作队”的信和上缴“四旧”“剥削所得”物品清单，透露了被抄户的恐惧无奈的心态及不惜自贬自辱的屈辱表现。现抄录几段如下：（为保护个人隐私略去名字——笔者注）

◇ 今有臭资本家曹××家属曹××交的物品：……（略）。民生路圣心里1号，66年8月30日

◇ 抄家登记簿——五经路26号郝××——反革命分子张××是大地主，家属郝××在文化大革命中认识到过去的罪恶，应该把现有的一切财产交给人民，向人民低头认罪；以后好好地劳动改造，重新做人。除上交衣服外，其余家具衣物也全部交上。反革命家属郝××，1966·8·31

◇ 抄家登记簿——劳动路先进里29号刘××——交物清单：我的家庭是资产阶级家庭，以前剥削劳动人民，欠了人民的债。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把以前剥削来的人民财产交还给人民。请工作队查收：镜台两个；留声机一架；书架五层；皮鞋三双；手表一块。劳动路先进里29号刘××，1966·8·28

◇ 抄家登记簿——民生路53号楚××——街道负责同志：现在我家有过去剥削来的东西，我坚决把它还给人民：（木茶几一对，箱子一对，……）。民生路53号楚××，1966年9月3日

◇ 抄家登记簿——潘××，劳动路先进里27号；王××，民主道4号；修××，进步道43号；刘××，五经路农建里4号——登记簿记载了该街区在“红八月”九天内被抄家300多户，登记在案的被抄物品有：金银锭、金银饰品、翡翠饰品、现金、存款单、存折、债券、粮票、银元、古钱币、古旧瓷器、古旧字画、古籍善本、古旧家具、铜镜、铜佛、宝剑、服饰、相机、收音机、金表等。

除金银、现金、粮票、手表等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眼中略显珍贵外，其它均属“四旧”销毁之列，被视如粪土。在登记簿上，旧字画以捆计，古籍善本以车计、旧瓷器均以筐计，传统宝物的身价与它们的主人一样卑贱。当年这些古董几乎没有赝品，历经千百年的天灾人祸、战乱动荡保存下来，最终也难逃一劫。在那个无法无天、崇尚暴力、蔑视文化、愚昧荒唐的年代里，天津原意租界居住区几天查抄只是文革浩劫的沧海一粟。让我们牢记历史教训，创建文明中华！

□ 来源：“个人图书馆”网站（[www.360doc.com](http://www.360doc.com)）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